

台灣社區工作與社區研究學刊 第十二卷第一期
2022年4月 頁 211-224
DOI: 10.53106/222372402022041201005

書評

書名：社企是門好生意？社會企業的批判與反思

作者：徐沛然

出版：2018，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評《社企是門好生意？社會企業的 批判與反思》

鍾怡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收稿日期：2022年4月8日，接受刊登日期：2022年4月26日。

* 通訊作者：yiting.jung@gmail.com

中文摘要

本文首先介紹《社企是門好生意？社會企業的批判與反思》一書的重點內容。第 1 章介紹社會企業的發展路徑，及其源自新自由主義開始主導世界經濟與政治運作的背景。第 2 章與第 3 章的內容在於翻轉美化社會企業的主流論述並呈現可能帶來的隱憂。第 4 章到第 8 章則以臺灣和全球各地案例進一步探討社會弱勢者照顧與消除貧窮等議題。本書提醒我們，這些看來簡單美好並鼓吹以個人努力方式來解決問題的行動，潛藏著將社會問題去政治化、鼓勵國家退讓給市場、將公民形塑為消費者的思維邏輯，因此必須謹慎看待並深入思考它們如何面對結構性因素。本文最後提出蒙德拉貢合作社之案例與本書對話，並借鏡經濟多樣性觀點來思考商業營利與社會公平正義之間的關係。

關鍵字：社會企業、新自由主義、去政治化、社會福利私有化、蒙德拉貢合作社、經濟多樣性

Book Review on “Is Social Enterprise Good Business?”

Yi-ting Chung

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highlights the contents of the book “Is Social Enterprise Good Business? Critical Thinking and Reflection.” The first chapter shows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ocial enterprise and its context of neoliberalism. The second and third chapters discuss a reverse view of mainstream discourses of social enterprise and overlooked problems. Cases of social care and eradicating poverty issues are discussed in Chapters 4 to 8. This book reminds us that behind those simple and good problem-solving projects based on individual effort, there might be hidden ideologies of the depoliticization of social problems, encouragement of giving room to the market, and transformation of citizens into consumers. Therefor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must be treated with caution, with measures to verify if it addresses structural challenges. Finally,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experiences of the Mondrago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 and the concept of diverse economies as another point of view to consider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rplus creating and social justice.

Keywords: Social Enterprise, Neoliberalism, Depoliticization, Privatization of Social Welfare, Mondragon Cooperative Corporation, Diverse Economies

近年來，「社會企業」跨越了社會學、社會工作、企業管理和社區研究等領域，成為眾所矚目的研究與實踐主題。「社會企業」幾乎全面地收穫了正面評價，但本書卻在書名上直接了當地為它加上問號，對「社會企業」強調以商業模式來解決社會問題此一一般性認知提出質疑與評論。

《社企是門好生意？社會企業的批判與反思》這本書在 2018 年出版時引發諸多討論，正反方的爭論使我們有機會對過往一面倒的觀點進行重新檢視。藉由爭論性議題做為案例，並引用國際上針對這些案例的批判性著作為證，本書從不同面向重新檢視「社會企業」並揭露了美麗面紗背後的各種問題。

揭開社會企業的美麗面紗

本書圍繞著社會企業的宣稱——以市場力量解決社會問題——提出各種質問，並運用國內外的經驗研究發現來進行回答與論證。此外，這本書也讓我們知道在各種被簡化與美化的陳述背後，社會企業在實際運作過程當中仍有許多問題有待被深入討論。也因此，在書中各章節可以看見作者的提問，例如，「滿足人們的需求是公益嗎？滿足需求等於解決問題嗎？以商業運作來解決問題，是否讓問題永存？製造問題的結構性成因是什麼？」等，透過作者嘗試回答這些提問，也引導讀者一同進行反思。

本書在第 1 章先針對社會企業的定義及起源進行破題。本書引用領導歐洲社會企業研究之學者 Jacques Defourny 的研究指出，社會企業的概念在 1990 年代開始獲得學界重視，其起源可分為歐洲路線與美國路線，由於各自的社會脈絡不同，也因此有不同的發展路徑、分歧的定義和著重面向。歐洲社會企業的出現源自於國家財政緊縮而調整社會福利政策，從原本提供救濟金的方式轉向

由非營利組織提供職業訓練和創造就業，於是帶動了新的組織模式。美國的社會企業起源亦與社會福利政策調整有關，自 1960 年代起便承接國家補助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的非營利組織在 1970 年代末期受到政策預算減縮影響，而需增加其他收入來源維持營運，於是開發產品獲得銷售收入或對服務進行收費，成為美國非營利組織的特色。美國學界開始關注此一現象並提出社會企業的概念，且 1993 年哈佛大學商學院開設了「社會企業創始」課程，使得此一概念日漸獲得討論和重視。此外，本書第 1 章的重點在於指出 1970 年代開始襲捲全球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典範，是社會企業在歐陸與美國的共同背景。作者引用兩篇指出社會企業反映社會福利政策市場化的研究，點出這些將市場和商業視為社會問題之萬靈丹的做法可能明顯地受新自由主義思想的影響。因而帶出本書探討社會企業的切入點，即道德因素與企業運作、公益與私利之間的界線模糊化，那麼社會企業的真实面貌為何？它在全球各地的流行產生何影響？

為了彰顯社會企業的價值，主流論述經常賦予它正面評價並較少談論其負面影響。本書在第 2 章與第 3 章嘗試翻轉「既賺錢又做好事」以及「社會企業可以拯救世界」的美化論述，呈現出社會企業可能帶來的隱憂。本書先透過這兩個章節呈現當前對社會企業美化論述的各種爭論，在第 4 章到第 8 章則以全球各地的案例進一步探討和說明。

第 2 章的內容強調原本屬於公益性質的社會福利服務提供要轉而以商業模式營運的困難和隱憂。首先面對的是「創業」期，必須順利地運作商業模式且能夠獲利支撐後續經營，其次則是在於創業成功後恐引來握有雄厚資本的大企業與之競爭。本書引用小社企「多扶接送」與大企業「中興保全」在提供失能人口接送服務的市場競爭為案例進行討論。就市場運作邏輯而言，預設了服務提供者越多則能滿足需求，且會因競爭而提升品質、價格下降。那麼在這樣的

邏輯下，新創社會企業是否會無力與之競爭而退出？或者採取壓低勞動成本的方式以價格戰維持營運？作者帶出這些問題引領我們反思「社會企業做好事，而一般企業做壞事」的簡化認知，並指出依照市場競爭的法則，即便是以做好事為出發點的社會企業也可能掉入陷阱，為維持獲利而罔顧企業內部運作的公平正義。

由此延伸的另一個反思課題是「『市場』是否真的能解決社會問題？」作者藉古巴有機農業的案例來說明政策與法規在推動有機農業發展上的效用，並反證鼓勵消費者購買和進步價值畫上等號的商品無法完全解決問題。例如，食品安全的確保除了透過廠商自律和消費者的明智選擇之外，尚需要政策、立法、制度來規範和監管，否則容易營造出消費便能解決社會問題的假象。

第3章藉由表面上具有理想價值實則是為了接收大型基金會盈餘分配使其享有免稅資格的「低利潤有限責任公司」為案例，對「社會企業的真正內涵為何」展開討論。書中指出要了解社會企業的內涵或它的特殊性必須重新思考社會企業中的「社會」和「企業」分別所指為何。例如，對社會企業的普遍性定義是它需以公益或慈善為目的，但此種抽象定義容易淪為修飾性詞語，如同書中所指出的，各行各業皆對應社會上的需求提供產品或服務，若將這些皆視為具有解決社會問題的公益目的，那麼便是「將企業的社會功能，反過來說成是企業的貢獻」。

「企業」做為一種經濟組織，它運作特點在於決策權由持有的股份多寡來決定，相較於「合作社」採取一人一票的決策方式，「企業」的決策方式較不民主，同屬於企業內部一份子的勞工，通常被排除在決策之外。本書指出要透過商業模式解決社會問題，其組織型式不必然只有「企業」一種，而認為「企業」這種組織較具效率，因而比政府或非營利組織更適合解決社會問題的想法，

其實仍是資本主義市場的運作邏輯，並且如作者所言，這樣的社會企業也會承襲一般企業所帶來的各種問題，例如本章最後所舉的臺灣案例，在仍以降低成本來追求最大利潤為經濟行動的法則之下，事業經營者與勞動者之間很可能無法跳脫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

事業經營者與勞動者之間的關係，在社會企業美好宣稱下的實際樣貌為何？本書在第4章以臺灣《大誌》為案例，揭露了善意背後可能忽略的勞資關係問題。書中直言此種商業模式將勞動力僱傭成本與風險成本皆外部化了，不免引人質疑其善意可能是行銷話術。這種源自於國外的《大誌》模式，通常會另外成立基金會來協助銷售員解決生活面的需求，但本書以英國《大誌》為例指出，儘管成立了基金會來協助銷售員，《大誌》模式仍難以讓銷售員獲得可維持基本生活的收入，還是需要倚賴國家的社會福利津貼。藉由這兩個案例，本書尖銳地指出《大誌》模式令人質疑之處在於它將社會安全網的建置工作轉嫁給消費大眾，鼓吹人們「相信購買商品就等於解決社會問題」，此種做法雖可能對單一街友帶來幫助，但是卻容易將此議題排除在公共政策領域之外，此即作者所言的「去政治化」。這是本書的核心論點，不僅貫穿所有案例，也是作者的終極關懷。

第5章討論的案例是從葛拉敏銀行經驗延伸出的微型貸款方案。一般認為微型貸款方案可以讓窮人擺脫貧困獲得收入來改善生活，甚至從貸款額度快速成長、高還款率和低違約率等這些數字來看，微型貸款似乎反映了在解決貧窮問題上的成效。然而，本書卻指出在微型貸款方案運作的數十年過程當中，反而造成印度鄉村貧窮問題的持續和加劇，甚至引發平民自殺潮。貸款額度的成長，實際上源自於微型貸款成為金融商品，年利率約20%的高額利息吸引了國際熱錢投入，且微型貸款銀行積極推銷下帶來了成長。高還款率和低違約率則

是建構在印度鄉村社會的緊密人情網絡上，利用連坐懲罰機制或當眾羞辱來逼迫借款人還債，而為了還債又再去借款的惡性循環，最終引爆了悲劇。

微型貸款在印度實踐的過程不僅未解決問題，還帶來新一輪的社會危機。本書引導讀者反思的問題是：窮人對金錢的需求是在創業還是家庭消費？創業一定會成功嗎？貧窮所帶來的生計難題，是透過個人創業就得以解決的嗎？作者認為，微型貸款被美化與神話化了，以致於造成普遍貧窮的結構性因素被忽略與掩飾。在第 5 章的最後，作者將國家所扮演的角色提出來進行討論。他指出在國家層次便缺乏資金提供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的地方，社會問題不可能透過個人創業來解決，且分散式的小額資金無法帶來產業技術的提升。微型貸款也需要國家介入與監管，印度安德拉邦的悲劇源於金融需求成為自由放任市場上的商品。

第 6 章針對第 2 章所拋出的問題：「是解決問題，還是靠問題營利？」以發展中國家的電力、用水為案例進行了深入討論。發展中國家普遍較欠缺的基礎設施包含可負擔的電力、能源和潔淨用水，這些需求近年來成為社會企業所販售的產品或服務。例如，「發電足球」此一產品，其設計理念是讓小朋友白天踢球發電供晚上照明讀書，此方案既可促進孩童運動又可滿足對電力的需求，因此發明者不僅獲得資金支持，亦透過群眾募資成功募得九萬多美元，將設計付諸實現為產品並捐贈到南非、坦尚尼亞、墨西哥等國家。然而，後續的問題一一湧現，如產品品質不佳，使得受贈者無法真正使用發電足球來滿足電力需求。

在發電足球案例之前，以解決用水需求為目標的「遊戲幫浦」方案也曾發生過類似問題。在主流媒體報導下，以孩童進行遊戲便能產生動力抽取地下水儲存到高處水塔的方案獲得廣泛好評，該方案不僅獲得世界銀行頒發的獎項，

也得到高額捐款讓方案實現。在遊戲幫浦大規模地被安裝到缺水社區後，問題也逐一浮現。例如，遊戲本身不會讓孩童持續地在玩，也就無法填滿水塔，負責取水的婦女反而因為要自行推動沈重的遊戲幫浦而增加了取水時間。更糟糕的問題是此方案原本嘗試解決的問題是「讓沒有辦法取水的社區能取水」，但最後遊戲幫浦卻只是替代掉原有的水壓式幫浦，未能真正提供缺水社區解決方案。

這些新創公司雖嘗試解決社會問題，卻引發了新的社會問題。除了一般性問題，如新創公司缺乏經驗、使用者非購買者難直接回饋使用評價、道德論述被過度宣傳、資金與捐款運用不透明等，本書指出這些以販售產品或服務的方案未必是真正的解方，反而使得具複雜成因的社會問題轉化為單一需求，並營造出只要購買和消費就可解決問題的想像。本書以「社會問題商品化」來指涉此一現象，並提醒讀者這些案例反映出社會企業透過「做好事」來營利或許未能解決社會問題反而可能本末倒置地將社會問題變成獲利工具。

第7章討論的案例是「貧窮旅遊」、「貧窮體驗活動」以及「黑暗對話社會企業」，這三個案例的特點是將貧困與弱勢處境轉化為可被親身經驗的過程，善意的出發點來自於預設人們會因親身體會過這些不利處境後而能夠引發出善意來提供援助、做出利他行動，但是這些善意最後導向的結果卻非如此。例如，「貧窮旅遊」反而讓當地社區感受到像被當成動物園中的動物般成為被觀賞的對象、訪客支付的費用最後未能改善當地社區的生活，以及本書最為質疑的是，當貧窮成為旅遊商品時貧窮問題可能會持續而不是被解決。以他人不幸做為旅遊、體驗對象，也引發了倫理道德上的爭議，即本書所提到的，在觀看了他人的不幸之後究竟是點燃了更多善舉，還是讓遊客獲得「感恩」與「惜福」的自我成長？如同本書對「黑暗對話社會企業」的質疑，體驗視障者經歷的黑暗或

許對體驗者個人成長有所幫助，也可能為部分視障者帶來工作機會，但此種模式無法真正改善視障者群體的普遍處境。作者透過這些案例所嘗試呼籲是，應慎重看待被導向以消費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並反思這些社會問題是否有進一步地被納入公共領域進行討論和解決方案研擬。

如同前幾章案例的共同特點——社會問題成為商品，第 8 章指出「金字塔底層商機」並非其宣稱的可有助於改善貧民的生活，反而讓社會問題被操作成了營利商機，也就是作者在第 6 章所言，社會問題被轉化為單一需求再進而被轉化為可購買的產品或服務。在這一章中，作者比較了 Living Good 這家非營利組織和跨國大企業聯合利華在發展中國家透過直銷方法販售健康與衛生產品的做法，並提出了一個質問：這兩個案例看起來都是既賺錢又做好事，如果 Living Good 是社會企業，那麼所有在發展中國家銷售可改善其生活之產品的企業是否也可以算是社會企業？這個提問呼應了第 3 章的核心問題，即社會企業的真正內涵是什麼？本書指出，如果一間企業將它為滿足消費者需求而進行產品或服務的銷售活動宣稱為在解決社會問題，那麼這可能是一種行銷話術。作者在這一章嚴厲地批判了「金字塔底層商機」以道德外衣包裝的偽善行為。

作者徐沛然長期關注社會議題，特別是勞動者權益，因此我們可以在此書看見勞動條件在社會企業或一般企業是否有所差別是作者的核心關懷。作者在後記中的告白也揭示，批判壞人很容易，但是要將好人做好事拿出來檢視是一件不討喜的事且易引發爭論，但他由衷地希望藉由此書對社會企業的討論注入不同的思考面向。

本書的重要貢獻在於提醒世人謹慎看待這些被美化與神化的社會問題解方，並引領讀者思考這些美好的方案是否真的能處理造成社會問題的結構性因素。出於善意的解決方案，很可能因缺乏系統性地問題診斷而見樹不見林，於是提

出了只治標不治本的方法，或甚至帶來更多災難。

本書也提醒我們，這些看來簡單美好並鼓吹以個人努力方式來解決社會問題的行動，背後潛藏著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意識型態。它將社會問題去政治化、鼓勵國家退讓給市場、將公民形塑為消費者，這些不僅是在迴避資本主義所造成的社會不平等問題，更是 1980 年代以來解決資本主義自身危機的方法。

揭開美麗面紗之外

那麼，在破解諸多社會企業神話之後，該如何面對社會問題仍有待解決的困境？對於這個問題，本書並沒有提供太多的具體答案，只在後記中提到，唯有透過將社會問題帶回政治領域並且以集體行動來改變製造問題的社會制度，才有可能真正將社會問題解決。除了將社會問題帶回公共領域之外，有志於投入社區發展和社會實踐工作的研究者或實務工作者，該如何面對商業營利與社會公平正義之間的關係？是否二者真的無法兼顧？

本文在此提出西班牙蒙德拉貢合作社集團（Mondragón Corporación Cooperativa）之案例做為對話。此合作社集團以製造煤油爐起家，透過市場交換機制獲得盈餘，這看來與一般企業無異，但由於它們是勞動者擁有的事業經營體（worker-owned），因此盈餘分配方式由社員民主參與來決定，包括維持基本生活開銷的薪資水準的訂定、社員勞動者之間的薪資差距、分配到再投資的額度比例等等。除了民主參與的決策機制，更重要的是，盈餘分配必須遵守社區利益優先於個人利益的原則。

就具體做法來看，蒙德拉貢合作社傾向將盈餘用來投資與成立新的合作社，以此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更進一步地，它們成立了信用合作社，透過社員的儲蓄來集結用於投資與成立新合作社的資金。這些做法的目的是要藉由擴大合作社事業來創造就業，並最終帶動社區整體的活化，而非僅僅是改善個人或個別家庭的生活消費水準。這是蒙德拉貢合作社有別於傳統左派主張勞動者權益優先之處（Gibson-Graham, 2003）。蒙德拉貢合作社集結個人儲蓄並用於擴大合作社事業的經驗，正好可回應印度微型貸款的分散式小額貸款問題，換言之，即社會問題或許非個人努力可解決，但個人力量可集結起來共同解決問題。

社會企業可能受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主導，但從更寬廣的視角來看，當代不管左派或右派都受到單一經濟觀點的束縛，從而限縮了我們對經濟過程的認識和可能展開的解放行動。女性主義經濟地理學者 Julie Graham 和 Katherine Gibson 指出，在二元論框架之下，人們普遍地忽略了這些論述與意識型態其實仍是「資本主義中心論」（capitalocentrism）觀點下的產物。她們在《後資本主義政治》一書中主張對「經濟」一詞要以更開放的視角重新看待，且特別要留意經濟活動的差異和多樣性。她們以冰山做為比喻，指出當前被認為在人類經濟活動中佔大多數的資本主義模式只是冰山中的一角，事實上世界各地仍存在著非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以及新興的另類經濟模式（Gibson-Graham, 2006：68-77）。這些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仍大量地存在而非現代化過程的殘餘項，例如，家庭中的無酬勞動。各種送禮的文化習俗，也反映出互惠式經濟活動和市場交換的混搭關係。

Gibson 與 Graham 最為特別的是，她們強調以改變社會問題為己任的行動者必須先改變自身的情感結構，認為開放性視角建立在樂觀的態度和立場上。她們反省自身受傳統左派訓練而習於以批判性視角認識世界的傾向，同時又認

為資本主義難以撼動而無法對那些具實驗性質之行動給予支持的悲觀態度。藉由引用 Wendy Brown 的著作《抵抗左派憂鬱》，她們指出若是一味追憶過往政治組織和工人運動的成功，將可能看不見眼前的政治機會。因此，如果期待改變社會並創造另類於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那麼改變態度與情感結構是有必要的，她們認為這是一種使可能性得以發生的條件（Gibson-Graham, 2006: 4-7）。

結語：採取多樣性觀點、與各種可能性為伍，繼續前行

在各種感人、美好或激勵人心的故事背後，其實有更多令人不願接受的苦難事實，《社企是門好生意？》一書揭露了美好神話背後的黑暗面，引領讀者看見隱身其後的運作邏輯，提醒我們對簡單美好的論述進行更嚴謹的審視和反思。但身為投入社會實踐的工作者與學術研究者如何在看到黑暗面後，重新燃起對改變社會的熱情並著手下一步行動？

本書提供的一個正向啟發是，對任何宣稱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皆需要對它們進行事後的評估。藉由將它們視為「實驗」，因而需要謹慎評估它們對社會帶來的正面或負面影響。我們當然要抱持懷疑論觀點審慎看待任何宣稱為「好」的商業運作，但本文另外借用 Gibson-Graham 的多樣經濟觀點來與本書對話，希望有志於解決社會問題的行動者不需因嘗試性方案所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而停下腳步或悲觀憂鬱、失去希望。

集體行動有賴眾多個人展開行動後集結，批判與反思能夠讓改變走在正確的航向上，同時不能或缺的是讓航行持續被驅動的信念與熱情。

參考文獻

- Gibson-Graham, J. K. (2003). Enabling Ethical Economies: Cooperativism and Class. *Critical Sociology*, 29(2), 123-161.
- Gibson-Graham, J. K. (2006).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